

边远地区乡村教师的家庭教育理念、 实践与阶层文化的形成

杜亮 牛丽莉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乡村教师是我国农村地区具有类中产特征的社会群体之一。基于云南、新疆地区部分年轻乡村教师的质性材料,研究考察了该群体日常家庭教育理念和实践特征。借鉴布迪厄关于阶级的理论框架,研究分析了乡村教师家庭教育观念与实践中的“重教”“亲为”“自主”等群体文化特征。研究发现,这些特征与该群体所拥有的比较丰富的文化资本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群体社会流动经历的影响,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品味”。对乡村教师家庭教育观念与实践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深层次认识这一教师群体的教育观念,进一步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复杂的社会分层与文化生成过程。

关键词:乡村教师;家庭教育;中产阶级;文化生产;品味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8)05-0073-09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8.05.009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方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较大,西部边远乡村地区更是处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末梢。镶嵌于该社会结构中的乡村教师群体,他们相较于周围人群是收入稳定、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教师,与农村基层公务员及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农业技术人员等群体一起,成为我国农村地区最具备类中产阶级特征的乡村人群。这个与我国农村地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深度关联的重要人群如何界定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又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生产何种群体文化?

借鉴从文化层面把握阶级形成过程及社会群体边界的研究传统,^{[1][2]}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于身处我国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群体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日常生活观念和实践特征,从而深入理解这一群体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及其与群体社会轨迹和位置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处在这一特定社会空间位置的群

体是否正在形成独特的阶层文化“品味”?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对乡村教师的教育观念与实践的研究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下,也就是在他们专业工作的学校教育情境之外的家庭生活情境下进行的考察。通过对边远地区乡村教师家庭教育观念与行为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深层次认识这一教师群体的教育观念,从而把握未来乡村教育发展的可能倾向。同时,作为乡村社会生活中收入稳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类中产阶级人群,对这一群体的教育观念与实践的把握,也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当前我国复杂的社会分层与阶级文化特征。

二、乡村教师日常生活及其社会分析: 文献综述

(一)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

目前,学界对乡村教师日常生活状态关注较少,主要论及物质生活需求、住房条件、人际关系、生活满意度等四方面。其中,大部分研究发现乡村教师正面临着较大的物质与精神困境:他们工资收入水

收稿日期:2018-05-29

作者简介:杜亮(1976—),男,四川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和教育人类学研究, E-mail:du@bnu.edu.cn;牛丽莉(1993—),女,山东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和教育人类学研究。

平低,难以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由于教学改革与不当的评价体系,他们有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不利的地理条件往往使他们社会交往受限,感情需求难以满足;由于生活条件有限,他们的业余时间大多用于各项娱乐活动,如打牌、聊天等,而非可以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活动。^{[3][4][5][6][7]}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虽然乡村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较为匮乏,但其精神生活却是“充盈”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他们有较多休闲时间,虽几乎没有审美娱乐型的休闲活动,但“他们追求知足常乐,秉持简单平凡的人生态度”^{[8][9]}。

上述研究将乡村教师生活分割为不同方面进行调查分析,较好地展现了某些乡村地区总体教师的生活状况。然而,现有研究几乎都是以问卷为主的调查研究,缺乏对乡村教师日常生活的深描,尚未涉及乡村教师对生活状态的解释及日常生活实践。因此本研究关注边远地区乡村教师群体的生活日常经验特别是日常家庭教育观念和和实践,从而力图把握该群体的文化样态与群体特征。

(二)乡村教师与中产阶级

是否可以将乡村教师群体视为当前我国中产阶级群体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具有争议的问题。伴随着社会变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中产阶级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目前关于我国中产阶级的定义,在学界虽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学者多采用职业类别、收入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作为划分我国社会分层的核心标准。^{[10][11]}在学界影响较大的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12]将当前我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按照这一划分方式,中小学教师包括乡村教师群体似可纳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由于其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源,这一群体被归属于社会中层乃至中上层。另一位对社会分层研究影响较大的学者李培林也持有类似的观点^[11]:在他的划分体系中,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是中产阶级的测量指标。他将符合三项中产阶级标准的人群界定为“核心中产阶级”,符合其中两项指标的人群定义为“半核心中产阶级”,仅符合一项指标的人群定义为“边缘中产阶级”。按照这一标准,乡村教师群体,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至少属于“边缘中产阶级”的范畴。^[13]从工资收入水平来看,根据2017版《中国统计年鉴》^[14],2016年全国教育行业平均年工资为74498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569元)。考

虑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出台以后针对边远农村地区教师的专门津贴补贴政策^[15],这些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应该不低于本地区同类人员平均水准。所以从几方面综合来看,乡村学校教师的社会地位至少已符合“边缘中产阶级”乃至“半核心中产阶级”的范畴。

此外,近年来随着对中产阶级文化研究的关注,也有部分学者从生活方式与群体文化的角度探讨不同社会阶级的差异与区分。^{[16][17]}其中,研究以消费方式^{[18][19]}为主,还包括子女教养^[20]、公共事务参与^[21]等方面,如洪岩璧通过比较不同阶级的教养行为,指出相较于底层群体,尽管中产阶级在子女教养上有更多的资本投入,但教养关系上却无明显阶级差异。^[20]与之相似,有学者指出,在消费方面,由于我国中产阶级还是第一代,自身缺乏统一的“品味”,目前社会区隔也只是“非品味性区隔”,并非文化区隔。^[18]

综上所述,从目前国内关于中产阶级的主流界定来看,边远地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中产群体特征。然而,现有研究中从阶级形成的文化视角入手对包括乡村教师在内的中等收入社会群体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中对乡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中产群体关注就更少。因此,本研究试图从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对该群体的阶级地位及其文化特征加以把握。此外,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中产阶级群体发展时间较短,这一群体还没有形成独特的文化“品味”,包括独特的家庭教养行为和模式。这个结论当前是否成立?本研究也将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三)阶级、社会轨迹与惯习(habitus)

本文将借用布迪厄的阶级理论框架,分析乡村教师群体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实践表现出的阶级文化特征。如前所述,通过对生活方式的考察来分析和把握不同阶级的界限与区隔是近年来国内学者日益重视的研究途径。这种关于阶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的影响。在布迪厄看来,对一定阶级或者阶层(class fraction)的界定不能简单依赖诸如职业、收入或者教育水平等几个简单的指标,而应当看到这些指标之下的“隐藏特征”(subsidiary characteristics)^{[2][102]}。也即,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特定位置并非个体实践的决定因

素,相反可能恰恰是特定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在通往生产关系中的特定位置过程中起到了筛选标准的作用。布迪厄写道:

因此研究者必须建构客观的阶级(objective class),也即处于相似生存条件下的社会成员,这些生存条件相应带来相似的制约作用与同质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s),从而使得这一群体具有类似的实践方式;这些处境相似的社会成员同时拥有一系列共同的属性,包括客观属性(譬如财物与权力——有时这些拥有权还受到法律的保护),以及内化的属性,也即阶级惯习(特别是特定的认知与分类图式系统(classificatory schemes))。^{[2]101}

布迪厄认为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位置,这些位置由个体或者群体拥有的不同形式的资本——主要指经济与文化资本总量及结构所决定,也即布迪厄所述的“客观生存条件”(objective conditions)所决定。而阶级或社会群体惯习就是这种“客观生存条件”的内化,但同时重要的是惯习又是生成和维持特定客观生存条件的力量和前提。惯习由一整套“理念、思想和行为图式”构成^[22],并且通过“统一的、带有生成性的行为与意见准则”的形式表达出来。^{[23]161}

然而,对社会成员或者群体惯习也即思想与实践的把握,仅仅通过分析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位置,也即其经济文化资本的总量与结构是不够的。布迪厄认为,如果研究者要完全理解个体或群体实践,除开把握他们在特定时间所占据的社会空间位置之外,还需要同时考虑个体或群体的“轨迹效应”(trajectory effect)。具体来说,这是指特定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过去与将来可能占据的社会位置,以及由这些连续的社会位置所显现出来的社会轨迹带给该成员观念与性情的影响。换言之即社会个体或群体所拥有的资本总量与结构的“历史演进”轨迹对该成员关于其特定社会位置——以及基于这个位置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和观念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实践,需要同时考察来自两方面的“效应”,一是“灌输效应”(inculcation effect),也即社会成员身处的特定的社会空间位置,或者说该成员的特定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影响效应;一是“轨迹效应”,也即社会成员的上升或下降的社会流动轨迹带来的观念与性情方面的

影响效应。^{[2]111}

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将讨论这两类效应是否和如何在乡村教师群体日常生活中的教育观念与实践得以体现,也即探讨这两类效应如何塑造了边远地区乡村教师的群体文化。具体来说,我们将论及该群体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群体成员关于自身社会位置的理解如何影响其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实践,也关注了该群体的社会流动经历可能给他们的家庭教育观念与实践带来的影响。这一点在此前的研究中鲜有涉及。此外,我们还试图通过把握乡村教师群体的文化特征来深入理解这一群体在当前我国社会中的社会位置,并与其他关联社会人群相对照进而理解深刻变革的当今中国社会群体版图^[24]。

三、研究方法

为了解边远地区乡村教师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实践,研究运用半结构式深入访谈和焦点组访谈方法收集材料。受访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云南边远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师,我们先后对26位教师进行了长约1小时的半结构式访谈,以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与感受。另一部分参与者是来自新疆农村乡镇地区的7位中小学教师,他们均为语文学科骨干教师。我们就家居、休闲和教育等日常生活话题进行了三次深入的焦点组访谈,每次访谈约1~1.5小时。访谈结束后,受访者与研究共同转录、阅读与分析材料,并展开了三次集中讨论,以便通过参与者检验(member check),确保所收集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研究对收集的大量质性材料进行分层编码,采用类属分析,反复比照不同个案间共性,归纳分析我国边远乡村教师在家庭教育理念与实践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并将其与中产阶级文化进行比较,进而讨论在我国边远地区该群体所处社会位置及其群体文化形成过程。

在研究对象选取上,考虑到多数现有基于文化视角的中产阶级研究大都聚焦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产群体^[25],我们的研究参与者大多是出生或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边远地区乡村教师,他们都是当下乡村学校教育工作的生力军。同时,从家庭生活方面来看,受访者也多处在孩子生养和教育的关键时期。因此,本研究将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深入理解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特征。

表1 参与研究的边远地区乡村教师基本情况(N=33)

变量	变量取值	参与者百分比(%)
性别	男	27.3
	女	72.7
民族	汉族	48.5
	少数民族	51.5
年龄	21~30岁	60.6
	31~40岁	33.3
	40岁以上	6.1
教龄	10年及以下	75.7
	11~20年	15.2
	20年以上	9.1
学校类型	小学	90.9
	中学	9.1
单位所在地区	云南	78.8
	新疆	21.2

四、乡村教师子女教育的理念和实践特征

通过对参与教师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教师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都非常重视,这种重视除了许多教师特别强调对孩子养育与教育过程中的亲身参与之外,还表现在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将孩子的教育与成长需求置于家庭决定乃至事业选择的优先地位。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教师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出这一群体所拥有的较为稳定与丰富的文化与经济资本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参与者丰富的文化资本以及其自身通过教育体系实现社会流动的经历,给他们的教育观念和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一)对学校教育的信任及期待

研究显示,我国目前年轻的乡村教师多数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村家庭。^{[13]17-19[26]}我们的研究参与者也大都生于乡村,父母常年生活在农村,受教育水平不高,而这些乡村教师接受过较高水平的专业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而且这个流动过程主要通过学校教育体系得以实现。这样的社会轨迹导致这个群体对现行的学校教育体系十分信任,他们期待能够为子女谋求高质量的学校教育。他们通常也不是学校教育的批判者,愿意依赖现有学校体系培养自己的孩子,期望制度化教育能够成为孩子维持

自身地位或向上流动的通道。

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教师居住选择和房产购置决定中。房产购置是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最重要的消费决定之一,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对城市房产的拥有也是中国中产群体地位标志之一。^[27]在访谈中,几乎所有乡村教师都透露自己已经在县以上的城镇中买房,或者计划买房。孩子的教育前景是他们做出这样的居住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相较于乡村,城市一般聚集了优秀的教师资源、完备的教育设施和系统的教育过程。在访谈中他们流露出在房产购置的决定过程中对城市学校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资源的特别重视和追求。有一位教师谈到,考虑到六年级对小学升学的重要性,他在孩子四年级时就开始筹划搬去县城,转去县上上学:

在五年级之前,我们原来住在乡下,一直在我们乡里上学。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搬到县里去了。那时我问他,想不想到县里的小学上学?他说,不想。因为他在我们乡上的小学相对来说要出色一些,他害怕到了县里以后压力大,竞争多,可能受不了那么大的落差……到五年级下学期,他自己也感觉到了换语文、数学老师的影响,后面就自己提出来到县里学习。我一听他说想要到县里去上学,我就特别高兴。我说好,你只要提出来了,我就趁热打铁,不再给他时间犹豫,就转到县里去了,也是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除了通过居住地选择和房产购置为孩子追逐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之外,参与研究的教师所表达的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教育理念。乡村教师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大致包含“上大学”“性格开朗”“学一门技术”三类。“上大学”意味着拥有一项被制度认可的文化资本,这一点期待与上文提到的教师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信任相关,考虑到这一群体成员多通过教育系统实现了上升性社会流动,并且绝大部分自身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一点期望并不奇怪。而“性格开朗”则反映了一种善于待人接物、与自我相处的性情倾向,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更容易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在访谈中,还有的教师提出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门技术”。例如有教师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门技术,有一样拿出手的,不能像我这样啥都不行。”本研究的参与者大部分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专业技术资格或者职称,然而在有的教师看

来,制度化的教师资格并不能视为一项严格的专业技术,甚至认为自己是“啥都不行”,真正的专业技术应该具有“拿得出手”的特征。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陈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分参与者并不认为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身份,或者说期望自己的子女具有更强的“专业技术”特征。这种期望一方面反映了教师对作为文化资本的“专业技术”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为在教师分层体系中地位偏低的农村教师群体的生活经验与现实认知。^[26]换言之,这个乡村教师群体通过教育获取教师的专业地位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因此他们认可“技术”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达到的乡村教师位置及其在专业人员等级中较低的地位使得他们期待子女能够获取更“拿得出手”的专业技术,或者说具有更高的资本兑换率(rate of conversion)的文化资本。“轨迹效应”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即教师们关于教育的理解——作为其对社会现实的理解的一部分——同时受到他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空间位置以及他们到达这个位置的社会流动轨迹的深刻影响。

(二)亲力亲为的教育及其资本支撑

乡村教师大都十分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强调。当然,我国的文化传统向来以注重教育闻名,我国是所谓具有“儒家传统”或者“东亚文化”的主要地区之一^[28]。但是除了关注和强调教育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以及对孩子有比较高的教育期望之外,参与研究的乡村教师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在孩子教育过程中家长的亲力亲为。很明显,这自然与教师自身的职业属性密切相关,同时,他们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本在两个方面有利于他们亲身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一是其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能够认识到家庭中密切的亲子接触和家长的教育参与对于孩子成长与学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的知识水平与文化资源使得他们有条件亲身参与孩子的教育。

例如在家里,教师会竭尽所能地为子女提供充足的书籍,让孩子尽可能早地接触书籍。有的教师甚至针对子女不同成长阶段的特征拟定了阅读计划。以某位教师为例,在访谈中他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自己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接触到的书籍:在学龄前,他给孩子买了较贵的看图识字的卡片。伴随着孩子兴趣的变化,识字能力与阅读能力的提升,为了满足孩子的读书愿望,他给孩子购买了《四大名著》

与其他作文书。而孩子进入中学后,他主要购买了工具书、教辅书等。从他精心给孩子安排的分阶段阅读计划可以看出其拥有的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本,也即对于不同种类书籍以及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阅读需求的把握。这样的文化和教育鉴别能力使得这一群体能够充分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

除了注重付出时间与精力亲身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之外,教师还会对孩子未来的学习地点与教育环境进行非常细致深入的考察分析。孩子就读学校中的教师的专业素养、师生的民族构成以及城乡背景可能都是构成影响乡村教师做出择校决策的重要因素。例如来自云南的某教师在考虑孩子的学校选择时对城乡学校教师配置的差异的分析十分深入,“如果在镇子上(或者)市里面都有专门专科老师,像我们在这边的话,一个老师要教很多课的……说心里话一个老师不可能上那么多课。”而身处新疆地区的另一位教师则详尽地说明了为自己年幼的孩子选择幼儿园的过程:

两个(幼儿园)基本上都是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多,但是取决于……哪个地方汉族教师多。……现在年轻的幼儿园老师都是说汉语,但是在管理孩子(的时候),孩子太小的话(民族老师)还是说民族语言。……(另外)三幼有大部分招的是农村的孩子,有一年冬天我记得是好像那段时间出那种麻疹,像三幼、四幼情况就特别严重,因为农村孩子家里不太注意这方面。

从这位教师的比较过程可以看出,他的择校决策带有缜密的逻辑。汉语是在主流文化中通行的语言,孩子较早地在汉语环境中学习,他可能获得在交换中更有价值的文化资本。同样地,同辈群体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之一,作为家长,乡村教师可能更期待自己的孩子可以从同辈群体中获得更优质的文化资本。除此之外,这位教师还比较了不同幼儿园教师的风格差异,并结合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加以选择。据她的观察,少数民族教师带孩子们会“玩得很开心”,但在她看来在对孩子的很多习惯的培养上却“不是特别严格”,而她更倾向于对不良行为的管教较为严格的氛围。这种对孩子纪律性的强调表明对特定性情气质的偏好构成教师的惯习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某教师在现有的社会空间位置下所形成的世界观(vision of the world),或者说是其文化资本身体化(embodied state)的结

果^[29],深刻影响其教育选择与实践。

总之,尽管乡村教师身处边远地区,但他们依然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与经济资本,特别是与周边其他社会人群相比。而相对于经济资本,参与教师的文化资本显然具有更为突出的地位。这些相对丰富的文化资本一方面引导乡村教师更加重视对子女教育的亲身参与,另一方面也对这种教育上的亲力亲为提供了重要支撑。换言之,包括教育知识在内的丰富的文化资本使得这些教师认识到亲子互动与家长参与在孩子成长和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又有足够的身体化、客体化乃至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支撑他们的密切教育参与。我们的这一观察与现有文献中许多关于中产阶级文化的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许多现有研究强调中产阶级对于文化资本传承的特别关注与重视^[30],以及家庭文化资本与学生的教育成就之间的密切关联^[31]。参与本研究的乡村教师对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视以及自身的亲力亲为显然与这些观点一致。然而有研究者认为我国中产阶级在子女教养行为上虽然有更多的资本投入,但与底层群体相比却并无明显阶级差异^[18],这里我们虽然并未作这种对比,但乡村教师对子女教育参与的亲力亲为及其背后所需的大量的文化资本的支撑,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阶级群体在子女教育上是否存在群体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三)自主与自律的消费个体

与乡村教师的访谈材料显示,这些教师一般都会为孩子购买教育服务,这些教师是乡村地区教育消费市场里的重要人群之一。例如来自北疆乡镇的某教师介绍儿子的课后班经历道,“经过这么多年,他参加过的兴趣班有绘画、书法、小新星英语、葫芦丝和吉他,这是他参加过的……他中间有换的过程。到现在为止,他在学的就是吉他、书法和小新星。”在她看来,如果孩子没有一项特长,那么他与他人比较“会觉得比别人少点什么东西”。这一点说明乡村教师具有比较稳定很可观的经济收入,能够支撑他们在当地的教育消费行为。另一方面,与乡村的其他人群特别是主体农民群体相比,乡村教师是更加具备在这方面消费和投资主动意识。

但是在教育消费市场里,这些教师并不倾向于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而是鼓励孩子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爱好,并逐渐形成具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个体。例如来自云南的某教师在访谈中告诉我们,

自己的孩子10岁了,平时只要是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内,具体选择参加哪些兴趣班都由孩子自己决定。除此之外,在娱乐互动、穿着方式等方面,她都会让孩子自己做主选择。这位教师认为长此以往,孩子逐步对“她要买什么,她能买什么”能够形成自己的主见。从这一过程可以窥见作为独立自主的消费个体的中产阶级,乡村教师如何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关注个性化理性消费文化的培养:在子女尚未具有消费能力的时候,父母将自主选择的权利转让给了孩子,正是这种自主选择权的赋予,使得孩子在消费过程中更可能考虑个性因素,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在这里,日常实践塑造群体文化的关键在于乡村教师家庭会将选择权、话语权转让给孩子。而通过这一家庭教育实践,这些教师的子女逐渐成长为潜在的独立自主的消费个体。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家庭教育实践与当今我国乡村教师群体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化进程相关。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方面解放和张扬了个体理性,同时承认和保护了个体主体性。^[32]事实上,研究者在当前我国的一些中产阶级群体身上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消费习惯与行为模式的出现与发展。^{[18][33]}而乡村教师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对子女自主选择能力的关注与培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带有明显的中产阶级特征的群体文化气质的发展与延续。换言之,在这个带有中产特征的社会群体中不但开始培育与发展起来特定的文化品性,而且这种文化还表现出代际传承的趋势,从而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品味区隔”。

在美国学者拉鲁(Lareau)关于不同阶级家庭教育的著名研究中^{[30]14-32},她深入揭示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家庭教养惯习的显著差异,中产阶级子女教养方式特征可被归纳为协商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具体表现为父母主动培养并评估孩子的天赋、观点和技能;成人协调(orchestrate)孩子的娱乐生活;孩子可对父母的言论提出质疑,父母与子女之间有长期的协商;代表孩子对学校提出批评(criticism)并进行干预,训练孩子独立思维和批判能力。在子女教养的日常实践中,乡村教师群体大都表现出了协商培养的特征。家长倾向于赋予孩子较大的自主权,尊重孩子合理的个人意志,并往往愿意根据孩子的意见与反馈调整自身的一些行为方式。例如某位云南教师就在访谈中提到他会主动根据孩子的

反应反思并改进自己的教育方法:原先他只是让孩子看图画或读故事给孩子听,但现在他打算启发孩子自主思考和想象力,让他想象并陈述图画中蕴含的故事。

另外,对培养孩子自主性与独立个性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参与研究的这些教师不会限制孩子的自主选择。当然,这种限制往往也是非常理性的,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乡村教师群体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本在他们的性情气质和行为实践上留下的印迹。前文曾提到的某教师对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的关注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之一。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也更多地观察到,这些乡村教师会在充分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权——譬如乐意满足孩子购买漫画书等与学校知识无关的书籍的需求的同时——的同时非常精心地给孩子的娱乐活动和时间制定各种制约规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教师对孩子自律能力特别是有节制的消费习惯的重视与培养。例如有位教师在家里允许孩子自由地决定电视和游戏内容,但必须严格遵守规定的时间安排,孩子可以在晚上6点到7点看电视,也可以在中午12点半到1点上网玩游戏。这样在拥有选择权的同时孩子也需要学会严格的节制,从而成为自律的社会个体。另一位来自云南的教师向研究者介绍了自己引导孩子消费的原则。在她看来,孩子的消费内容与知识学习一样都应该被分类,不同类型具有不同的价值:

研究者:基本上他问你要钱,你所有的消费都满足?

某教师:只要是合理的都满足。

研究者:什么样的算不合理?

某教师:比如他要去买他们班同学买的什么,反正是我认为没有用的那些书,武打类的那些我就不买,我就好好跟他说像那些书最好不要看。要看什么,开始是生气,后来哄哄,哄了以后还是算了,就是这样一句话。

研究者:像漫画你觉得是可以允许的部分,武打是不可以的?

某教师:我觉得那些好像是太暴力了吧,我觉得我不想让他接触这些。

从这位教师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规范孩子消费行为时的严密逻辑。在这样的精心引导下,孩子得以学会理性地对待消费选择和行为,逐渐

成长为能够自我节制的理性消费者。

五、结论

虽然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绝对收入并不高,但与当地其他社会人群相比,他们收入稳定,多数处于中等水平,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当地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社会人群之一。本文通过观察部分边远地区乡村教师日常生活中的子女教育观念和实践,试图把握新时期的乡村教师群体是否开始形成自身特有的群体文化特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研究中的乡村教师群体表现出一些明显的教育观念和实践特征,这些观念和实践与群体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资本特别是丰富的文化资本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群体的社会流动经历的影响,即社会“轨迹效应”明显。

乡村教师群体通过学校教育体系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上升流动,因此他们一方面对当前的学校教育体系比较信任,对孩子的教育期待多包括“上大学”,也即至少不低于自己的教育程度;但另一方面他们虽然在职业上属于专业人员群体,但即使在教师群体的职业等级中也处于比较不利的位置,因此一部分参与者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超越自己,掌握一门“拿得出手”的技术。可见这样的教育期望与乡村教师们当前社会空间位置以及社会流动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从参与教师日常的家庭教育实践来看,他们往往比较注重对孩子教育的亲力亲为,他们懂得密切的亲子接触在孩子成长和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本亲身参与乃至设计孩子的教育过程。这一点对于缺乏相应文化资本的底层群体是难以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教师的家庭教育实践反映了独特的中产阶级特征。再者,乡村教师也是教育市场中积极的消费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作为中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教育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教师在消费过程中反映出对孩子两个方面倾向的培养:一是自主选择能力的培养;一是孩子的理性和节制的消费习惯。这两方面的教育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有研究中关于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描述,同时还揭示在这个带有中产特征的社会群体中不但开始培育与发展起来特定的文化品性,而且这种文化还表现出代际传承的趋势,正在成长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在诸如消费习惯等方面显现

出独特的“品味”区隔。

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目前学界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即当前我国中产阶级是否具有显著的群体文化特征,或者说“文化品味区隔”?目前所见研究多认为由于这个阶级尚处在形成过程中,与底层群体相比,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阶级文化,包括教育观念和实践。然而我们收集的关于乡村教师的实据支持了相反的答案,这一群体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实践在表现出较明显的中产群体特征的同时,还表现出与其群体成员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和结构密切相关独特文化品味。本研究将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理解当前我国类似中产群体的“文化品味”特征,考虑到近几十年来该群体在我国社会中快速增长的规模和影响力,本研究也会帮助我们把握我国社会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独特文化精神气质。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于学校教师群体特殊的职业身份,本文期望通过对乡村教师日常家庭教育的了解和把握,更好地理解当前乡村教师群体呈现出的新的教育观念和实践特征及其可能带来的教育变迁。

参考文献:

- [1]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 [2]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 常宝宁, 崔岐恩. 农村中小学教师生存状态变革: 2000—2007[J]. 教育科学, 2010(3): 58-63.
- [4] 方健华. 切实给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以生命关怀——基于苏北农村教师生存状态调查的思考[J]. 课程·教材·教法, 2008(2): 73-76.
- [5] 孙钰华, 马俊军. 农村教师流失问题的职业锚角度考察[J]. 教育发展研究, 2007(8): 48-51.
- [6] 田景正, 周端云. 湖南省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现状调查[J]. 教师教育研究, 2009(4): 66-70.
- [7] 肖正德.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生存境遇与改善策略[J]. 中国教育学刊, 2011(8): 1-4.
- [8] 姜勇, 何敏, 张云亮. 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幼儿园教师精神状况考察——物质的匮乏与心灵的充盈[J]. 学前教育研究, 2016(7): 31-39.
- [9] 张文强. 欠发达地区农村教师整体幸福感调查分析——以河南省D市为例[J]. 中国教育学刊, 2013(6): 20-22.
- [10] 李春玲. 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5): 68-77.
- [11] 李培林, 张翼.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 社会, 2008(2): 1-19, 220.
- [12]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7-23.
- [13] 郑新蓉, 杜亮, 魏曼华, 等. 中国特岗教师蓝皮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7 [EB/OL].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2018-07-18].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 [15]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5〕43号 [A/OL]. (2015-06-08) [2018-05-1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08/content_9833.htm.
- [16] 吕大乐, 刘硕. 中产小区: 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J]. 社会学研究, 2010(6): 25-40, 242.
- [17] 程金华, 吴晓刚.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J]. 社会学研究, 2010, 25(2): 151-179, 245-246.
- [18] 王建平. 分化与区隔: 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消费特征及其社会效应[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1): 69-72.
- [19] 朱迪. 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12(4): 146-166, 244-245.
- [20] 洪岩璧, 赵延东. 从资本到惯习: 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 社会学研究, 2014(4): 73-93, 243.
- [21] 孙中伟, 黄时进. “中产”更环保吗? 城市居民的低碳行为及态度——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15(3): 37-44.
- [22] BOURDIEU P.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9, 7(1): 14-25.
- [23] BOURDIEU P, Passeron J 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M]. Richard Nice, tra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7: 161.
- [24] WEIS L, 闫晓庆, 杜亮. “工厂的阴影”——兼论质性研究的实践与应用[J]. 教育学报, 2013, 9(1): 49-54.
- [25] 李路路, 李升. “殊途异类”: 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7(6): 15-37, 242.
- [26] 杜亮, 何柳. 社会空间及新一代乡村教师的社会定位过程分析——基于云南两县的案例研究[J]. 教育学报, 2016, 12(6): 53-61.
- [27] 李强. 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4): 42-53.
- [28] KIPNIS A B. 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29]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M]// John G. Richards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241-258.
- [30] LAREAU A. Unequal Childhood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4-32.
- [31] 顾辉. 教育: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一项对 H 市两所高中的研究[D/OL]. 上海:上海大学, 2010.
- [32] 詹宏伟. 中国改革与个人主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33] 李春玲. 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J]. 广东社会科学, 2011(4):210-218.

The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among Rural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Culture

DU Liang, NIU Li-li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Rural teachers are one of the social groups who are likely to possess certain middle class characteristics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materials collected with young rural teachers in Yunnan and Xinjiang, the study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up's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A Bourdieudian framework of class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group's cultural features reflected in their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such as emphasis on teaching, doing it by oneself and being autonomous etc.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among the rural teacher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ch cultural capital possessed by the group, and they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group's experiences of social mobility, which leads to the presence of unique culture taste of the group.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among rural teachers can help us to hav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perception of this teacher group and thus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rocess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rural teacher; family education; middle class; cultural production; taste

(责任编辑 吴 婷)